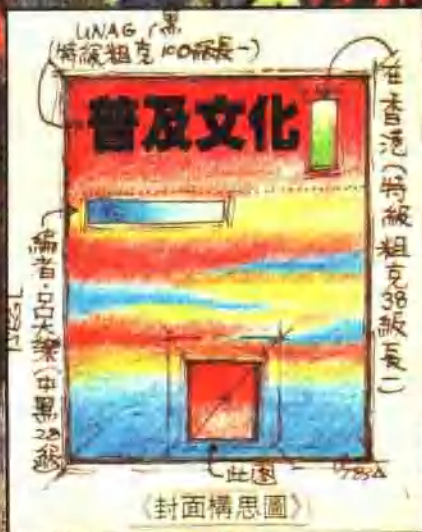


普及文化

編者：呂大樂



普及文化 在香港

呂大樂編

曙光圖書

出版：曙光圖書公司
印刷：傳真廣告印刷公司
灣仔船街32號二樓
版次：一九八三年第一版

目錄

編者序

(I) 緒論

關於普及文化研究	呂大樂	2
----------	-----	---

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	姚堯	10
-----------	----	----

(II) 青少年與青少年文化

透視香港年青人的消費文化	張月愛、章嘉雯	21
--------------	---------	----

怕也沒用，新浪潮已經來臨	章嘉雯	32
--------------	-----	----

(III) 婦女與婦女雜誌

婦女雜誌的女性生活	游眞	37
-----------	----	----

沒有問題的女性	章嘉雯	43
---------	-----	----

揭破時裝的底牌	林木	46
---------	----	----

怎樣泡製一個安樂窩	游眞	52
-----------	----	----

(IV) 傳播媒界與普及文化

電視足球——一個不完整的版本	梁款	55
----------------	----	----

變色龍的兩個系統	舒寡	63
----------	----	----

程燦的意義	章嘉雯	71
-------	-----	----

勇者無懼及其他	章嘉雯	73
---------	-----	----

(V) 其他

中文歌曲	張月愛	76
------	-----	----

說童話	游眞	87
-----	----	----

三越之生活秩序	游眞	91
---------	----	----

廣告與古代藝術品	林木	93
----------	----	----

工人階級文化與足球運動	章嘉雯	95
-------------	-----	----

麥理浩延長任期	章嘉雯	99
---------	-----	----

香港救星	章嘉雯	102
------	-----	-----

講閒話	章嘉雯	104
-----	-----	-----

編者序

書內的文章，曾經在《學苑》、《新晚報》（「風華版」）、《信報》（月刊及「文化失言」專欄）、《七十年代》裏刊登，現只作了少許文字的修改。出版的目的，一是整理及編輯一些關於本地普及文化的分析，二是近年不少青年中心及學校，均對普及文化提高了關注，有些並且舉辦了講座及其他學習活動，要使青年朋友有機會加深對問題的認識，能夠提供一些閱讀參考資料，定會有所幫助。

在編輯這本書的過程中，邵國華和林木提出了不少寶貴意見，游真、梁款雖遠在英倫，仍經常在來往書信中打氣，使中途曾經停頓下來的工作，可以在短時間內再次得以開展，張月愛更幫忙了不少編輯工作，及指出了好些本來忽視了的問題。但沒有了馬國明的支持和忍耐，則可能早就中途而廢了。在這裏我希望可以表達一下對這幾位朋友的謝意。

關於 普及文化研究

呂大樂

這篇導言並不是甚麼普及文化理論的討論。它只不過是一些背景資料的介紹。但我相信，這些背景資料對更深入地瞭解這些文章，是十分重要的；其實只要讀者細心閱讀，就不難會發覺，這些文章背後的理論架構，有過一些轉變，而這些關於理論的轉變，並不純粹是對知識的探討，反而是一些總結了實踐經驗後的自我反省，及對文化批判策略的重新檢討，自此，要明白這些理論實踐的意義，就需要掌握其背後的歷史資料。

收輯在這本小書裏的文章，代表着一種共同的經驗。作者們都曾經在《學苑》（香港大學學生會刊物）或「大眾文化行動組」工作，並且以文化批判作為工作目標；在過去數年間，他／她們寫過分析普及文化的文章，也組織過文化行動；作者們嘗試以這些工作，來積極地面對在社會上產生着重大影響的普及文化。

1

一九七七，夏。

三位大學畢業生與一位來自兩間中學的預科生，組織了「大眾文化行動組」。他／她們的第一項工作，為「大眾傳播探討計劃」，這個計劃包括有電視節目的內容和功能的分析，在完成調查工作之後，於一九七八年二月間發表了報告書。但在此以前，這羣年青人已開始在另一個普及文化的問題上，展開了工作；「大眾文化行動組」於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初，發表了一篇以「從近日出現的『毛片』，論及電影中的裸露及色情問題」為題的評論。

在一年之後，產生了一次反色情的文化行動。

在一九七八年四月號的《學苑》裏，有一篇文章針對當時政府公佈的「色情鏡頭意見調查」作出了批評；而該期學苑的專題題目，是——「大眾文化」。

好幾位「大眾文化行動組」的組員，在進入大學之後，都參加了《學苑》的工作，但大學校園對普及文化早有關注。早在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度的《學苑》，就有曾彭基的「香港的最後探戈」——一篇批判色情文化的文章；其後一九七七至七八的一屆，亦有辦過批判消費主義的專題。

這個「文化批判」的傳統，可由兩方面去理解：一是當時普及文化的發展情況，二是在理論層面上，對文化和「文化批判」的作用的理解。前者將會在本書內多篇文章裏有所分析，因此不打算在這裏交代了，以下的討論，主要是針對文化理論分析的方面。

「文化批判」主要受到兩套理論的影響：一是「大眾社會

」理論，另外是新左派馬克思主義的社會分析。

早期在《學苑》和《介入》（「大眾文化行動組」的刊物）刊登的文章，均運用了「大眾社會」理論來分析普及化。這種分析的特點，是採納了高等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分法，它肯定了高等文化的優越性，同時也認為在傳統社會裏的社區，擁有一套人民自發而成的普及文化，但工業社會的來臨，使文化產生了轉變。正面的影響，是高等文化不再為一少撮精英份子所壟斷，但這卻使文化成為了一種經濟生產性的活動，現代社會裏的文化，是商業機構和傳播媒介從上而下所推銷出來的文化產品，這磨平了高等文化的優越成份，使大眾文化成為了庸俗的文化，而這種大眾文化，正好適應了現代人的需要，因為自從傳統社會裏的社區解體以後，現代人便要面對現代社會裏組織理性化與精密分工所產生的壓力，因而建立了一種追求大眾認同和但求即時享用的心理。換言之，現代人本身也有傾向接受大眾文化。「大眾社會」理論基本上分析了大眾文化在客觀與主觀兩方面的存在條件。

但當我們較小心地閱讀《學苑》與《介入》的文章時，便不難會發覺，新左派馬克思主義社會分析的影響甚大；我們甚至可以說，新左派社會分析給「大眾社會」理論注入了激進的成份，使關於大眾文化的分析，更為豐富。

新左派文化分析的組成部份，主要有盧卡契關於「假意識」的分析、和「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的研究。而其中馬爾庫斯和佛洛姆著作，更是早期重要的參考書籍。新左派文化分析的出現，與傳統馬克思主義運用於指導革命實踐時所遇到之困難，有十分密切的關係。近代社會主義革命實踐中的一個難題，是儘管西方先進資本主義國家都曾發生過嚴重的經濟衰退，工人階級的革命卻並沒有出現，在這樣的情況下，近

代的馬克思主義者對所謂經濟基礎的結構性矛盾決定革命實踐的理論，作出了深入的批判，而新左派的特點，就是在批判「經濟決定論」時，重新強調了階級自覺性的重要，因此在戰後蓬勃地發展起來的大眾傳播媒介，和深入民間的普及文化，自然成為了被關注的現象，從而瞭解它們對階級意識的建立起着怎樣的作用。

新左派文化分析所以能夠與「大眾社會」理論結合起來，其實也不難理解。這兩套理論，均有懷舊的傾向，對工業革命以前的，人際關係緊密的社區生活，有着偏好，同時也肯定了高級文化的優越性，對充滿割離感的現代文化，抱着排斥的態度。

不過，早期的《學苑》和「大眾文化行動組」所採用的分析工具，主要還是新左派文化分析，多於「大眾社會」理論。這一點可以從其針對的問題——文化商品化而不是工業文明——而有所瞭解，另外，或多或少受到這套文化分析而產生出來的「文化批判」和「反色情文化運動」，均反映出新左派的傾向。

2

「反色情文化聯合委員會」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由十個文教及大專學生團體組成。這個運動所針對的問題，是由於文化的商品化，而造成了色情文化泛濫；「聯委會」在《反色情文化聯刊》裏，就指出了「在這個官能主義及文化「商品化」的趨勢之下，「性」成為一個單供刺激享樂、可作交易買賣的商品，而不再是愛情生活中的一個組成部份。」

「聯委會」向政府提出了兩項建議：（一）加強對大眾傳播媒介的管制；（二）在整個管制過程中，市民應有一定的參

與。但「聯委會」的工作，並不僅於分析與評論等文字工作。在一九七九年一月十七日晚上，它就曾針對當時麗的電視「哈囉夜歸人」節目的內容，發動抗議行動，其後於三、四月間，又再次組織了行動，向政府施加壓力，以加強對大眾傳播媒介的管制。

不過，這一連串行動並未能迫使政府修改其對大眾傳播媒介的政策，再加上不少新聞報導，均將這次批判性商品化的行動，形容為另一次衛道之仕的道德運動，促使參與團體反省這次文化行動不足之處。

從這次檢討中發掘了兩個關於文化行動的問題。第一，文化行動不可能完全獨立於政治運動，因為社會運動整體發展的水平，影響着公眾如何理解該文化行動的意義，第二，承接以上的問題，新左派政治實踐簡化了社會運動發展的過程，單憑透過對日常生活與文化的批判，來刺激勞工階級，使其重新拾回他們的階級意識，並不足以使社會運動發展起來，而這並不是香港的特殊情況，西方國家的新左派運動均有同樣的問題。

這些問題促使了《學苑》與「大眾文化行動組」的成員重新考慮文化批判的理論基礎。事實上，年青馬克思所討論的割離問題，與文化商品化等概念，並不能就普及文化提供嚴謹的分析，它們將整個文化範疇的問題，還原為資本主義的必然發展，在除忽略了文化本身的內容之外，還更可能提供一套完全排拒現存文化的策略，因此無法指引文化行動如何去與普及文化進行鬥爭。

3

在這次實踐經驗的檢討後，《學苑》與「大眾文化行動組」又重新摸索分析普及文化及策劃文化行動的方向。

其實早在孟浪與遵文合寫的「談文化批判」一文裏，在提出文化批判這個社會運動新方向時，已吸取了阿爾杜塞爾的結構馬克思主義對意識形態的分析，與葛蘭西的霸權理論，不過在這個時期，他們還是以一個新左派的角度，來看待這些新的概念。

新階段裏的普及文化分析，主要是受到阿爾杜塞爾的意識形態分析、葛蘭西的霸權理論、與符號學的影響。其實這個轉變並不難理解。這幾套理論的特點，是它們都能夠針對前一期新左派文化分析好些不足之處。首先，它們並不像新左派文化分析般，有着強烈的人文主義的傾向，這可以幫助它們避免了將理論建基於對人性的假設之上，因而更能做到客觀的社會分析；其次是它們能夠協助建立普及文化的內容分析，這比較新左派理論的社會心理學，更能提供嚴謹的普及文化研究。

關於內容分析，由瑟許爾建立起來的符號學，豐富了馬克思主義的意識形態理論。後者主要只能夠分析到意識形態在社會各個環節所起的作用，但卻未能掌握產生意識形態效果的過程；在這個方面，符號學填補意識形態理論的空隙。例如巴特的神話研究，就能夠在分析普及文化的訊息時，同時也能夠將問題結合到社會性質的分析。後期《學苑》與「大眾文化」行動組所做的電視肥皂劇的內容分析，新聞研究、及青少年次文化分析，均使用了意識形態理論和符號學，為分析工具。

這個新階段，可以說是理論研究與文化策略的探索。

西方馬克思主義一方面起着指引普及文化研究的作用，另一方面，也帶來了馬克思主義意識形態理論的突破。阿爾杜塞爾在重新閱讀馬克思的著作時，提出一個對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築之間關係的新理解，根據他的論點，經濟基礎對上層建築的影響，只限於在最終一刻，產生決定性的作用，換言之，政治

與意識形態兩個層面，是可以有其相對的自主性。這個理解之所以廣泛地受到注視，是因為它指出了過去馬克思主義理論，有過份地強調了經濟基礎與階級關係，對文化、政治等部份的影響。事實上，批判「經濟決定論」和「階級還原論」，已成為近年社會主義社會理論的重要部份。

對普及文化研究而言，婦女解放運動，是一個富有影響力的刺激。婦解運動所針對的問題，是性別主義，而一性對另一性的壓迫，或兩性同時受到性別主義的壓迫，並不直接是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與階級關係，所產生的現象，因此性別主義所造成的問題，就並非在改變了經濟基礎之後，會自行消失的。婦解運動的一個重要訊息，是性別主義這個問題的複雜性，而這進一步加強了文化分析批判「經濟決定論」與「階級還原論」的取向。

理論的探索，帶來文化策略的轉變。在理論方面批判本質論的目的，在於重新強調介入普及文化的可能性及意義。前文已有提及，新左派文化分析的一個缺點，對現存普及文化，純粹抱有一種排拒的態度，這種分析和策略，往往將普及的，等同為必然會鞏固現存制度的文化，換言之，這是一個「一度空度」的角度——現存制度有吸納一切反對勢力的能力，既然普及文化沒有進步的成份，那自然便沒有介入的必要了。但一如葛蘭西在討論民間文化時所說，現存制度裏的文化，既有其保守的一面，亦有進步的部份，問題是如果將後者擴大，發揮其進步的方面，從而可以做到社會改革的效果。這種分析和策略，促使文化評論者，更嚴謹地對待文化的內容，以及更自覺有介入普及文化的需要。

4

葛蘭西將知識份子劃分為兩類，一為傳統知識份子，他／她們的工作，是發展現存的知識，扮演著一個保守的角色，二為有機知識份子，他／她們對社會抱有批判的態度，推動著社會改革。而有機知識份子的工作一方面是以嚴謹的態度來挑戰主導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是將批判發展深入民間的教育工作。

本文簡短地介紹了作者們批判普及文化的經驗。這個經驗並不純粹是理論的探索，而是一種令理論與實踐結合起來的嘗試，不過這是一件艱難的工作。這本書內的文章，大概可以做到上述工作的一部份，這就是逐步建立起挑戰主導意識形態的文化理論與具體分析，但它們還未可以深入民間，產生教育羣衆的作用。這正是文化批判工作中最困難的地方。理論與羣衆的結合，本身就是一個發展的過程，沒有踏出第一步，就不可能有進一步的發展，事物總是這樣。

聲、色、藝

回顧香港大眾文化的發展

姚堯

粵劇、舞廳、電影、電視、流行曲曾先後成為香港大眾文化的主流或旁支，其興起衰落均有著不同的歷史背景、經濟及社會因素。本文希望就著香港大眾文化的歷史發展作一略述，並在可能範圍下作點個人分析。為著清晰明瞭起見，筆者將整個歷史發展分作四個階段。

一、中華文化延續期 (一九四五—一九六四)

在此期間，中華文化及傳統道德觀念仍然影響著香港人的心態，反映在一般日常生活方式、藝術、娛樂、文化都可見存在著濃厚的中國民間色彩。故此香港大眾文化與傳統文化仍有著千絲萬縷的關係。

當時的哥兒、闊少及太太們都十分喜歡看粵劇、捧優伶。

「淒涼姊妹碑」、「斷腸姑嫂斷腸夫」、「萬惡浮爲首」、「百行孝爲先」等傳統劇目經常在高陞或普慶戲院賣個滿堂紅，更能贏取舊式婦女一絲傷感，幾行珠淚，也往往爲大眾在茶餘飯後提供了話題。

除了看粵劇、捧戲子外，有閒階級也是蓮香或高陞歌壇的顧曲者。中國的傳統樂曲，絲竹動人，也有繞樑三日的地方，但曾幾何時隨著無線電廣播的發展，提供音樂節目，奪去歌壇不少生意，於是歌壇事業在五十年代後期已經衰微沉寂。當時，廣播節目成爲大眾的最廉價娛樂，兼且成爲一般人生活的一部份。早期節目內容主要是古樂演奏、粵劇轉播、音樂播放或教育節目。其後更增播空中小說，體育及時事報導。普羅大眾經一天風塵撲撲之後，最享受莫如仰臥帆布牀，諦聽耳畔收音機所傳送的節目。

電影事業自五零年代開始便一枝獨秀，那些名伶一變而爲「兩棲藝人」，故此所謂粵語片不外是粵劇的電影版本而已。其後粵語片題材輾轉多變，先後出現了神怪武俠片、時裝現實片及民初倫理片，但基本上其意識形態的反映仍承接著中國舊倫理社會的道德觀念或價值系統。試回顧一下粵語片，吳君麗、余麗珍代表著中國傳統所嘉許的貞烈節婦，在邪惡勢力卡壓之下，仍緊咬著三貞九烈的道德教條。新馬仔、鄧寄塵的都市喜劇反映出典型的小人物在蛻變中的現代化都市所製造的夾縫中爲生活而掙扎，而其奮鬥方式是十分中國化的，以農村社會式的互助互勉，守望相助的精神去超越現實生活所加諸他們的挫折與憂慮；編導未免太保守與樂觀，更有點阿Q的氣味，但五十年代的觀眾是很接受的。至於關德興的黃飛鴻不外是儒家思想中仁者的化身；吳楚帆的梗直不屈正是林沖與武松式的硬漢；而忠厚憨直得近乎愚鈍的曹達華式大英雄不過是保守的農村羣衆所能容忍和嚮往的「以武犯禁」的游俠。從這些人物角色在

當代受到認同與歡迎的程度觀察，可見那時的香港人仍有一份對中國傳統的執著。

顯然，中國文化在此期間並未滙成主流，祇是零星地影響著香港人的生活及文化。同時歐美文化透過電影及其他媒介逐漸滲襲到這個殖民地。夢的工廠的製成品成為文化侵略的犀利武器，西方的物質文明及享樂文化為香港這個發展中的工業社會裏的羣衆製造了一個又一個彩色絢爛的繁華春夢。他們除了驚嘆於「賓虛」、「桂河橋」、「風雲羣英會」的場面浩大，氣勢磅礴之外，更因為偷偷地在東樂戲院欣賞到碧姬芭鐸半裸背影或一瞬即逝的露胸鏡頭而大有快感。

而跳舞這洋玩意更不知沉醉了多少中產階級的哥兒姐兒與上海闊少。每當華燈初上，稍為有些撩人情緒的掩映樂聲，他們儘又想找伴侶，上舞場，扭著蛇腰，踏著狐步，像柳絮一般飄忽款擺，或擁抱著柔軀的軀體跳著慢四，醉生夢死去了。

從烽火後的敗瓦頹垣中甦醒起來的香港，雖然逐漸繁華安定，但因為整個資本主義經濟架構及機能尚未成熟及和諧地運行，與先進工業國的經濟發展在相比之下仍有天壤雲泥之別，生活指標仍停留在一個較低的水平，故尚未有足夠條件成為一個羣衆性的消費社會（資本家當時心力交瘁所要解決的環結是怎樣才能多、快、好、省地生產以應市場需要，而仍未有生產過剩的危機，故祇需無情地鞭策著工人去忍辱、刻苦、「忘我」地生產，而並不鼓勵他們去消費、縱慾）。加上流亡在港的中國人，一貫受著中華文化的薰陶，仍根深蒂固地保留著中國農村社會崇尚節儉、謹愿及誠樸的保守心態，與資本主義文化顯得格格不入。因此大眾文化在缺乏一個穩固的經濟或意識型態基礎下尚處於雛形的狀態。粵劇、電影、廣播均是中產階級擁有的，甚具濃厚中國色彩的文娛生活，雖非與中下層社會絕緣，但可肯定是絕不大衆化的。

二、占士邦及BEATNIK 文化期（六四—六七）

進入六零年代，粵劇緩慢的板腔已迎不上現代都市急速的節奏，開始被社會所淘汰。一九六二年開始，外國片（尤其是特務片）在港抬頭。鐵金剛占士邦擊敗魯博士，勇破神秘島之後，從牙買加趕到蘇俄，破了龐大的間諜網，然後再鼓其神勇，大戰金手指，接著連破魔鬼黨，火箭嶺及鑽石黨。無論在邁亞密或拉斯維加斯，他必週旋於衆美女之間，享受著醉紅色的燈光、撩人的音樂、香檳、醇酒、肉體……而蘇聯的間諜或魔鬼黨的首腦必被他如小丑般玩弄於鼓掌之上，他成功的關鍵全靠個體的力量——一個人的英勇、超人的智慧及神靈的庇蔭。而占士邦片所標榜的正是負責任的個人英雄主義（他對國家社會滿不在乎，興趣全在於醇酒美人）。雖然這種英雄形象與中國傳統的截然不同，但在香港這個西方意識形態開始植根的社會甚得年青一代所接受和仰慕。

適逢一九六四年六月八日，四狂赴港，掀起了一鼓浪潮，披頭文化也乘勢捲進香港。基本上，披頭文化，占士甸式的叛逆青年與嬉皮士所表現的正是對都市文明的消極反叛。他們頹廢、浪漫或故作大真，砸碎現代的價值觀念，並大談失落、空虛、疏離，對文明社會作情緒上的叛離。然而當披頭文化傳到香港，與占士邦文化合流後，便凝固成一種特殊的文化型態。年青一代東施效顰，模仿四狂的天真爛漫、蒼白頹廢，在大喊失落、空虛之餘，寄情於酒色與狂歡，對社會不負半點責任，表面看來是一種對社會的消極反叛，其實骨子裏已是毫當批評地效法西方的一套生活方式，以示自己是時髦人士，唬嚇本地同胞，並掩飾其頹廢、病態及墮落的本質。